

抗战的中国丛刊之六

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 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

上海人民出版社

3

4

抗战的中国丛刊之六

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 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53

抗战的中国史料之六
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
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1 号

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公厘 1/32 印张 5 3/8 字数 117,000

1958 年 11 月第 1 版

195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6,000

统一书号：11074·171

定价：(7) 0.60 元

内部发行

刊 印 說 明

由于中国現代革命史(中共党史)和中国現代史的教学及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我們准备編輯或翻印有关中国現代史的資料。由于人力、物力不足和資料缺乏，工作中难免有缺点和錯誤，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正和协助。

翻印的資料，除明显的錯誤加以改正外，一般均照原書翻印不加修改，閱时請注意。

本会所翻印的前延安時事問題研究会編輯的“抗战的中国丛刊”已出五种，其第一种为“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本書內容是它的第一編的补充。本書原名为“九一八以来的中国”。

本委员会系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俄語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等五院校的中国革命史教研組(室)所組成。

办公地点設在：北京西郊北京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

中国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员会

1957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九一八”后国民党的对外政策	1
(一)“九一八”的炮声与不抵抗	1
(二)“一二八”抗战与上海协定	6
(三)日寇进攻热河与塘沽协定	11
(四)第一次华北事变与何梅协定	16
(五)第二次华北事变与中日談判的停頓	23
第二章 “九一八”后国民党的对内政策	32
(一)“九一八”后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及其斗争	34
(二)国民党的围剿苏维埃红军	37
(三)国民党对抗日群众运动的镇压	44
(四)国民党对抗日武装发动的破坏	51
(五)国民党强化反动的政治机构	58
(六)反动统治的装饰品	67
第三章 “九一八”后的国民经济与国民党的 经济财政政策	76
(一)“九一八”后中国经济的浩劫	76
(二)国民党是怎样应付中国经济财政危机的	89
(三)从“复兴农村”到“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99

(四) 国民党的财政危机及其挽救方法	105
第四章 “九一八”后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政策	111
(一) “教育救国”的理论与实际	111
(二) “文化建设”呢？还是文化的毁灭	121
第五章 “九一八”以来的民族解放运动	128
(一) “九一八”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发	128
(二) 民族解放运动的潜伏时期（从上海协定到 长城抗战）.....	136
(三) 民族解放运动的复兴	139
(四) 民族解放运动的继续高涨	143
(五) 六年来东北人民的解放斗争	151
第六章 芦沟桥抗战以前的一般形势	157
(一) 伪蒙军的侵绥与绥远抗战。西安事变与国内和平 的开始。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及其内外政策的转变.....	157
(二) 日寇的加紧进攻。全国人民抗日情绪更加高涨。 英、美、法等国对华问题态度的积极化。南京政府 的对日政策。日寇的新进攻与芦沟桥事变	161

第一章 “九一八”后国民党的 对外政策

(一) “九一八”的炮声与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前夜，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长江流域发生空前大水灾，十六省惨遭波及，灾民七千万，嗷嗷待哺，无以为生。同时军阀混战刚刚结束，鄂、豫、皖、湘、赣等省的剿共血战正在展开，南京与两广间的大战又在酝酿了。日本方面，则经济危机与国内矛盾日益增长，物价跌落，输出减少，工业生产停滞，工人失业增多，农民生活恶化，革命运动高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化等等，在在都使牠决心向外找出路。在国际方面，欧美各国正陷在深刻的经济危机中，无力兼顾远东；苏联五年计划还没有完成，国力尚未十分强大。

日寇趁着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锐意向中国进攻。先是一九三一年四月，日寇利用汉奸郝永德强租长春万宝山地方民地，五月遣使大批韩人入境开垦，强掘民田，枪杀当地农民数十，引起该处农民反抗，于是鼓动朝鲜各地排华运动，捣毁华侨在平壤、汉城等处的店宅，抢夺华侨财产，惨杀华侨数百人。跟着派中村大尉入满蒙调查地理，“遇匪失踪”后，日寇即借口向东北当局压迫，集中驻东北日军于沈阳。复自行炸毁南满路柳条沟桥樑，诬称为华军破坏。遂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开始军事行动。当夜日军一路

进攻东北两大营，先以大炮轟击，駐軍死伤数百，华軍奉令不抵抗，日軍順利地占領营房；另一路日軍向沈阳城内推进，城内軍警也奉令绝对不准抵抗，任由日軍繳械，到十九日晨，沈阳全城，已被日軍占領，所有軍、政、民、文化、財政等机关，悉被日軍占領，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制炮厂，及二百架飞机，完全入于日寇之手。統計一夜之間，損失达十八亿元以上。跟着分兵进攻安东、本溪、营口、牛庄、长春等处，駐軍奉不抵抗命令，任从敌人占領。二十日东占吉林，南迫錦州，并派海軍占領秦皇島，不久又进攻黑龙江，占領齐齐哈尔。总共头尾不到两月，两百万方里的肥沃領土，三千余万人民，四千余公里鐵路，无尽的資源，就在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断送了。

日寇之所以要进攻滿洲，为的是完成大陆政策，灭亡全中国，独占东亚，进攻苏联，称霸世界；为的是挽救日益加深的国内經濟危机，以及緩和日益增长的国内各种矛盾，以免革命的爆发。

日寇进攻滿洲的行动，引起了欧美各国极大的反响，但因为各帝国主义間的矛盾及其本身利益的关系，並沒有积极的行动。英帝国主义为着鼓励日本的进攻苏联，不但默許日本的占領滿洲，并且英外相西門在国联會議上，是公开袒护日本的。他認為滿洲的恢复“九一八”前状态，“决不是正当的解决办法”。法国对于“九一八”事变的态度，是和英国一致的，它也希望日本占領滿洲后便进攻苏联。美国因有在东北的投資計劃，态度比較积极，但因为得不到英法的合作，不敢单独行动。在事变发生后不久，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曾三次打电话給英外相西門，征求英国对付日本的方法，結果英国毫无确切表示（見史汀生著的远东之危机）。因此，美国只得于九月二十五日照会中日两国，希望依照国际条約和平解决。到一九

三二年一月七日，錦州失陷，美國仍得不到英國的明確表示，才宣布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表示不承認日本破壞條約所造成的任何事實。這些都顯然是從美國本身利益出發的。蘇聯除指出日本的侵略行為外，並動員蘇滿邊境軍隊，增強自衛力量，以靜觀事變的發展。

南京政府對於日寇這個空前進攻的唯一辦法是不抵抗和依賴國聯。在事變之前，政府已“通令各軍，遇有日軍尋衅，務須慎重，避免衝突”。當事變發生，“我軍向政府請示辦法，政府也不許衝突，又以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衅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絕對抱不抵抗主義”。（見南京出版的新亞細亞第三卷第一期記者自白）在事變後，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說：

“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見九月二十三日蔣介石在南京市黨員大會上演詞）

國民政府公開聲明：“現在政府既以此案件訴之國聯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希望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見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國民政府告全國軍民書）

蔣介石更相信：“……國聯這一次開會，一定能依照公道的主張，找得和平的路徑，使東亞和平，以至世界和平，不致為日本一國所破壞。”

又說：“我們現在固要盡力避免戰事，且在未至戰爭的時候，仍要鎮靜持重，無暴其氣。”

“我們在精神上已有最大的勝算，無論敵軍怎樣強大，怎樣來威脅我們，我們只是處之坦然，……我們更應相信國際有公約，人類有公道，我們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犧牲的精神去擁護。橫

暴不足畏，威力不足屈，我們要和平奮鬥，以捍御此次的國難，以擁護國際的公約。”（見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蔣介石在國府紀念周演詞）

這些都是不抵抗和依賴國聯政策的鐵證。這種不抵抗和依賴國聯的對外政策，在國民黨的宣言中也明顯的表現出來。它說：

“當事變之初，中國即提請國聯處理，期以國際間保障和平機關之制裁，伸張正義與公理。……中國政府尊重國聯決議，極力避免衝突，加意保護日僑，使無任何不幸事件發生……除依據決議……外，並履行中國方面關於該決議之其他一切義務。……並望國聯於此次開會時，執行盟約第十五及第十六條之規定，迅速予日本侵略行動以有效之制裁。更希望非戰公約與華府九國條約簽約之友邦履行其各該公約上之義務。”（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國民黨四次代表大會對外宣言）

南京政府不抵抗和依賴國聯的另一表現，是關於建立錦州中立區問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日寇因為中國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已順利地占領了東三省，因此它又向錦州進攻，並收買流氓襲擊天津。政府為着貫徹不抵抗和依賴國聯到底，於是當時的外長顧維鈞電令日內瓦代表施肇基，向國聯提議劃錦州為中立區，希望日軍不要繼續進迫，而以中國駐軍退入山海關內為交換條件。這個投降的計劃雖然為全國人民的反對而失敗了，但南京外交當局顧維鈞却在致友人電文中表示“不勝感慨”！

雖然南京政府及東北當局對日寇進攻採取了不抵抗主義，但是中國人民則採取了頑強的反抗。從“九一八”第二天始，中國人民便跑上了反抗的道路。九月間，上海有十萬大中小學學生的大罷課，有三萬五千日本碼頭工人的大罷工，以抗議日寇向東北的侵

略。九月二十六日，上海有十余万人的反日大集合。全国各地，从上海到成都，从平津到广州，所有的学生都卷入反对日寇进攻东北的热潮中。全国民众，尤其是城市的市民群众，热烈地参加了抵制日货和禁止和日人交易的杯葛运动。广州及香港等地日商日厂所有的中国工人，自动地一律辞工，宁可挨饥受饿。十月初，上海八十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派代表要求南京立即出兵抗日，要求政府发给枪械参加抗日。北平工人组织抗日救国会，组织邮工义勇军、宣传队等，积极进行抗日工作。上海商业界也宣誓自十月一日起不买卖日货。双十节那天，上海又有八万余人的反日大游行。十月十五日，上海五千余学生跑到北站要求站长拨车到南京请愿。一九三一年年底，十万余的平、津、粤、沪、汉等地的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并殴打政府人员，抗议他们的不抵抗政策。在这些抗日的群众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员均站在最前线。

与这同时，有马占山将军部下兵士的抗战。十一月中，在北满嫩江铁桥一役，击溃了日军的精锐部队多门师团，造成了抗日战争中光辉的一页。同时，辽西一带民众也奋起抗战，攻入营口，夺回盘山，占领打虎山车站，消灭古贺骑兵联队，收复锦县，攻击绥中，转战辽西各地，阻滞了日军向关内的进攻，延缓了日寇迅速占领东三省的计划。不到一年，东北义勇军曾发展到三四十万人，不断给敌人以重大打击。

当时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反日民族运动的高涨，以及针对着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之下，领导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英勇斗争。但当时的南京政府不但不接受共产党正确主张，而且到处压

迫抗日救国运动。

(二) “一二八”抗战与上海协定

日寇占领东北以后，即努力寻找新的借口，作为侵略的根据，适有日僧五人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在上海华界被人毆伤，日寇便認為千載一时的机会，調集兵艦，故意寻衅。二十日晨，日特务机关联合日侨焚燬三友实业社，并杀死华捕一人，同时召开上海日侨大会，遊行示威，捣毁沿途华人商店。二十四日，日特务机关派人縱火焚燬日公使重光公館，作为进攻上海的借口。二十七日，日領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道歉、惩凶、賠償損失及解散抗日团体等四項要求，限二十四小时内圓滿答复，否則日軍采取自由行动。当时上海市长吳鉄城已答应一一照办，而日海軍陆战队却于二十八晚开始軍事行动，先占天通庵車站，繼向北站、江湾、吳淞等处进攻。駐于淞沪的十九路軍，在上海市民，特別是在上海工人学生推动之下，实行了英勇的抗战，夺回天通庵和北站两火車站，激战二日，杀敌千余，給敌人以重大打击。日寇一方佯托英美領事調停，停战三日；一方向东京請援，以便扩大侵略。卒至三易主帅，不断增援，死伤逾万，费时三十三天，才乘着十九路軍兵力不敷，在浏河偷襲登陸，迫使十九路軍退至苏州崑山等处的第二道防綫。

日寇之所以进攻上海，是企图把国际視綫由东北問題轉移到上海問題上，是要在上海取得強固的軍事根据地，以巩固它在东三省既得的胜利，以及将来作为进攻中国內地的准备，是要用武力直接威胁南京政府，使它承認东三省的被占领，使它取消一切反日的排貨运动。

南京政府对于“一二八”事变同样也是采取不抵抗政策。在事变之前，南京政府是处处迁就日寇的要求。例如由南京授意上海市政府答复日領函中說：

“来函所提关于取締抗日运动一項，現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軌违法行为，业經令行主管局將該会取消，以維法紀。关于此类之越軌违法行为，本市长仍当本法治精神，令行取締。至于其他各抗日团体，并已令局予以取消。”

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日国府迁洛宣言中也說：

“政府为避免战争計，已不恤一再迁就日本要求，始則对于民众抗日之言論行动，稍涉激烈者均予禁止，繼則晓喻各种民众团体，自动取消抗日名义，……以杜強邻之借口。……上海市政府对于日本駐沪領事之要求，已予日領自身亦認為滿意之答复……。”

又如調动抗日情緒較高的十九路軍离沪（据十九路軍將領之一翁照垣在淞沪血战回忆录中說：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已接到南京政府命令，把駐在淞沪的十九路軍七十八师調往真茹、南翔，遺防由宪兵第六团接收，并且該团已于是日晚到达真茹，正待接收十九路軍防地，不过因为時間太晚，改迟一日），企图“避免战争”。

又如政府命令海軍的不抵抗，更是駭人听聞的。据監察委員高发唐等彈劾海軍部長陈紹寬呈文說：

“……当沪战发生之始，海軍部長陈紹寬密令各艦队，略謂：准日海軍司令来函，‘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軍不攻击日舰，日舰亦不攻击中国軍舰，以維友誼’等情，凡我艦队，应守鎮靜云云。厥后日海軍在下关开炮，該艦队司令秉承部長意旨，下紧急命令各艦队云：日海軍炮击獅子山炮台，及

京市，与我海軍无涉。非日舰炮击我舰，不准还击等語。同时上海高昌庙舰队，亦奉到上項命令。……十九路軍曾向海軍部借大炮，借鉄板，均被拒絕。日軍运输舰擱浅于白龙港三日之久，我海軍如当时前往轟击，必可获多数軍火。陈紹寬接得报告置之不理。所謂維持友誼者如此！以上各节，皆极駭人听闻，由該部次长李世甲事先与盐澤秘密干旋接洽。当十九路軍血战时，李世甲竟与日軍司令野村，同坐汽車参观各处战壕，万目睽睽，毫无忌憚。”（見監察公報第十五期）

在“一二八”事变发生以后，政府口头上虽然宣布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但实际上依然是不抵抗和依賴国联。它不但不积极援助十九路軍和上海市民的抗战，不但不增加兵力到上海，反而連自动請求参加抗战的第五軍官兵，也多方留难，卒以該軍士兵的坚决要求，才不得不准其开入淞沪战地。另一方面，則照会九国公約签字国駐华公使，乞其轉电政府，出而干涉；并再次請求国联主持“公道”。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因为在上海方面的利益較在东三省的利益为大，所以对于上海战争也較东三省战争着急。因此紛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議。英、美、法駐华公使也先后南下，奔走“調停”，其中尤以英使藍浦生为最努力。

在“調停”过程中，英、法、美、意、德五国，曾企图把上海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的“中立区”。它們为了实现这个計劃，于二月二日各自先后照会中日两国，“……提議停止冲突，（一）双方根据下列条件，立刻停止各种暴力行为；（二）两国間此后不再有动員或准备任何敌对行为；（三）在沪中、日作战人員，退出彼此接触地点；（四）設立中立区，分离双方作战人員，以保护公共租界，該項地区由中立国軍警駐防，各种办法，由領事团拟定；（五）两国一經接受

該項條約后，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據非戰公約及十二月九日國聯決議案之精神，在中立國觀察者或參與者協助之下，迅速進行商議，以解決一切懸案之事議……”。（見國聞周報第九卷第七期）南京政府對於是項提議，已經表示完全同意。在南京外交部復英、美等國牒文中說：“對於貴國政府所通知之提議，特行接受。”日本則提出在滬、漢、津、粵、青島等大商埠周圍，劃一不駐兵區，寬十五至二十英里，以為對抗英、美等國共管上海的計劃。（以上材料見國聞周報第九卷第七期）

中國人民對於日寇進攻上海是極端忿恨的。當日寇在上海挑釁之初，即有上海滬西日紗廠五千工人的反日總罷工。“一二八”事變發生以後，上海市的工人青年學生等踊躍地直接參加抗戰工作。全國各地民眾，特別是海外華僑，則舉行廣大的募捐運動，以援助十九路軍和上海市民的抗戰。中國共產黨的上海黨部，更發動了全上海日廠十萬工人的大罷工，堅持一個半月之久，以協助十九路軍的作戰；同時組織了上海各界民眾的抗日聯合會，吸收了廣大羣眾參加這個組織，進行了廣泛的募捐和慰勞等工作，動員了許多民眾直接參加作戰，並出版“反日民眾”等報，積極宣傳抗戰政策。

在政府方面，則一開始就托英、美等國出任“調停”，不過初時因為日本要求過高，一時不好馬上答應。到三月四日和十四日，國聯通過了兩個決議，要中日兩國在第三國協助下商訂停戰協定，並成立十九國委員會，專門負責處理上海戰爭事宜，加以英、美、法等國公使聯合各國駐滬領事的積極“調停”，以及英美兩國的某些恐嚇手段（如美國太平洋艦隊集中檀香山演習，以及英國通過在新加坡筑港案等），更由於日寇進攻上海的冒險行為，遭遇到十九路軍及上海市民的英勇抵抗，使它不能不暫時罷手。于是由我方代表

郭泰祺和日代表重光在五月五日成立如下的上海停战协定：

“第一条 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經下令停战，茲双方协定，自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战斗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問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 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之常态恢复未經决定办法以前，留駐其現在地位（当时中国军队駐崑山、苏州一带）。……

第三条 日本军队应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以前之原状。但鉴于須待容納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駐紮于上述区域之毗連地点。……

第四条 为証明双方之撤退起見，設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員。該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移交事宜，以便日軍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

第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詳見时事月报第六卷六月号）

这些条文，表面好象没有什么，但其实际所給予中国的損失則非常之大。例如第二条規定所謂“常态”，所謂“办法”，是广漠无边，日寇可以借口“办法”尚未决定，“常态”尚未恢复，則由苏州、崑山至上海的广漠地区，中国永无駐兵之权。又如第三条規定日軍“若干部队可暂时駐紮于上述各区毗連之地点”，所謂毗連地点，并没有規定界限，十里，百里，均可随日寇曲解。

不仅如此，除协定正文以外，會議录中还有三項諒解：一是政

府取締抗日；二是十九路軍換防；三是浦东及苏州河南岸，中国不得駐兵。（見韜奮著的激流集）这些“諒解”，后来事实証明，一一都成为事实了。抗日是“妨碍邦交”，十九路軍很快开到福建“勦共”，上海周围則不准华軍駐紮和設防，而日寇反可以把上海作为进攻中国内地的重要堡垒。

在上海停战协定后，中国共产党鉴于政府已向日寇投降屈服，于是公开对日宣布民族防御战争，并发表动员令，号召全国人民向日作战。这种号召虽是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政府的回答却是“先安内而后攘外，統一才能御侮”。（蒋介石語）

（三） 日寇进攻热河与塘沽协定

在上海协定以后，日寇努力于巩固滿洲的势力，建立滿洲傀儡組織，并与其訂立所謂“日滿議定書”（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把日寇所有在滿洲的侵略成果，都用明文确立起来。同时看到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及欧美各国軟弱，于是进一步扩展其侵略区域，先揚言热河是“滿洲国”的一部，以为侵略的先声；次宣言长城为伪滿的国界，以作攻取山海关及长城各口的准备。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日寇向山海关进攻，华北將領閻錫山、张学良等虽联名通电，声言“誓死抵抗”，可是不到五天，守軍何柱国旅便奉命退出。

日軍占領山海关后，即向热河进攻。南京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下，对于热河战事表面装成很关心的样子。它极言“热河为北方屏障，且多天險，政府已有准备，至少可守三个月”。同时派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偕张学良等到热河視察，以“表示政府抗日决心”。

（宋子文对热河各界欢迎詞）宋子文更装腔作势对热河守軍說：“你們只管打，子文敢断言中央必为諸君后盾，諸君打到那里，子文